

浪迹台湾岛

汪幸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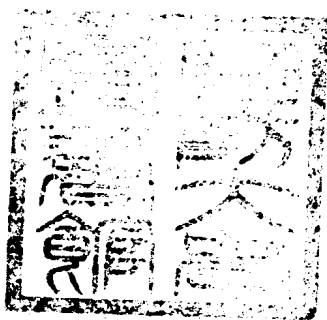
华文出版社



2 033 7499 0

浪迹台湾岛

汪幸福 著



华文出版社

1990年·北京

G091.60/03

责任编辑：王文祥

封面设计：冯光美

浪迹合湾岛

汪幸福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75 字数307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075—0061—6/1·76 定价：5.10元

一九五〇年冬。

“呜——”武昌开往广州的五十八次列车摇摇晃晃地驶出了车站。

第五号车厢里，拥挤着百余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坐着，有的靠着，还有的弯腿躺着。

车厢最后一排右侧，一位头戴咖啡色旧礼帽、身着灰黑色长袍的青年男子，翘着腿、眯眼靠在座椅背上。他的头随着颠簸的列车，不停地摆动着。列车走了一段，他怕被人认出来，轻轻地将礼帽沿往下扯了一下，眼睛和鼻子全被遮住。

列车进入湖南。

疲惫不堪的旅客们陆续在颠簸中睡着了。他心里忐忑不安，想睡睡不着。因为这次外逃，不知前途是凶是吉。

他叫赵长禄，三十五岁，出生在湖北黄冈县的一个乡村。他个头不太高，却长得腰圆膀粗、挺胸抬肩，是力量型的中等身材。除此之外，他的五官也生得端正，特别是那双又黑又亮的眼睛，给人一种聪颖、机灵的感觉。

赵长禄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出生后，父亲时常对人说：“我当了一辈子大老粗，扁担倒下来不知是一横，一生守着几亩地不能出门，将来就是讨饭，也要送儿子读点书。”上学的那天，他父亲特地请了邻近高家大湾知书熟文的高先生起了个又好听又吉利的名字——赵长禄。

赵长禄不负父望，入学后，勤奋苦读，成绩总在全校前三名。五年后，他进入县一中。

好梦总难圆。正当赵长禄一心求学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一九三九年春的一天下午，赵长禄从县城回家拿米时，正碰上乡长，绰号叫何阎王的带着八个乡丁来抓他三叔去当兵。他父亲见三弟身体瘦弱，又患了病，便跪在地上向何阎王苦苦求情、要求放三弟一条生路。何阎王一手叉在腰上，一手用鞭子指着他父亲的鼻子恶狠狠地说：“你们弟兄三人，抽一个天经地义，求什么情？你弟弟不去，老子马上放火烧房子！”

站在旁边的赵长禄怒火满腔。他恨不得抓起铁锹将何阎王斩成两节再逃跑。他冷静一想，觉得硬干不行。自己跑了，家里要遭殃。

他将父亲从地上扶起来。然后，冲到何阎王面前拍着胸说：

“你们不要抽病了的三叔，我去顶！”

何阎王瞟了赵长禄一眼，冷笑道：“那好，那好。”

这样，赵长禄顶替三叔到鄂东行署特务大队当了兵。他虽有文化，因不善吹牛拍马，再加上喜说直话，在特务大队干了多年升不了官。直到一九四六年秋，他由一熟人介绍到白崇禧管辖的一二六军才官运亨通，由排长到连长、副营长。一九四九年春南逃途中，他被委任为军部上校参谋。他上任刚刚十天，部队就在广西被共产党的军队围歼。在那次战斗中，他化装成樵夫仓惶逃回家中。

这年秋，他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与邻近的总路咀街上

的盐商郑世卿的女儿郑珍娥结了婚。

全国解放后，他在家坐立不安，担心受到人民政府的惩罚。一九五〇年春，他听说全国即将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瞒着家人偷偷逃到鄂东山区藏了一段时间，后又到汉口郊区躲了两个月。今天，他在过去一个老部下的帮助下，扮成商人，乘上了这趟南去的列车。

他想逃到香港或经香港去台湾。

车过岳阳，窗外刮起了大风。树上枯黄的残叶纷纷往下落，然后又被风掀起，似麻雀般在空中飞舞。

赵长禄被车厢里污浊的空气窒息得喘不过气。他很想打开窗子吸点外面的新鲜空气。不料窗子一开，风沙直往里冲，旅客们怨声载道。他迅速关上窗，又将头靠在椅背上佯装睡着了。

他想用假睡着的办法，探听车上人说话的内容，以分辨他们是些什么人，到何地去。他靠了老半天，没有人说这类话。车上这么多人，难道没有去香港、台湾的？未必找不到一个同路人？

赵长禄对面，坐着一高一矮的两个河南人。高个子留着一头长发，头顶中间一道白迹将头发分向两边。两个眼珠子凸得象要掉下来。他的一张嘴与众不同，四颗发了黄、又参差不齐的长门牙露在外面。他深知这四颗门牙不雅观，也太惹人注目，总想把它包住。由于嘴唇太短太薄，怎么也包不进去。为此，他对自己的这张嘴恨极了。他叫李志威，是原国民党汝南自卫大队的分队长。矮个子叫姚科，是原河南省民政厅的科员，长得很白，又很瘦。他眼睛高度近视，虽然戴着眼镜，观人看物，象是格外细致，总是瞅了又瞅。

李志威和姚科都是豫北劳改农场的犯人。因害怕镇压，利用深夜管教不严之机，从农场潜逃到武汉躲了几夭，然后混上了这趟列车。

他俩见车厢内旅客睡着了，便低声交谈起来。

“什么时候才能到广州？”李志威问。

“估计是明天上午。”

“从深圳去香港要顺利就好。”

“但愿。”

李志威要继续往下讲，姚科用手阻拦了一下，示意他不要说了。

其实，他们俩的对话，赵长禄听得一清二楚。他想，对面的这两人是同路人，不必戒备了。

经过半天的观察，赵长禄弄清了五号车厢的大部分人是逃往香港、台湾的地主、恶霸、绅士和国民党的残余军政人员。他心里默默地说：“在列车上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眼前的两个河南人既已说明了是去香港，我可与他俩结个伴。”

赵长禄抬起头，摘下帽子，他从衣袋里掏出三支大公牌香烟，先给李志威和姚科各一支，然后塞一支在自己嘴里。

李志威和姚科都是烟鬼。车厢里有人抽烟，他俩早馋得流口水，只是碍于面子才没有伸手去讨。赵长禄这时给他们递烟，可说是雪里送炭。

也就是这两支烟，赵长禄很快同他们亲热起来。

“到香港怎么过境？”赵长禄边擦火边问姚科。

“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有人从广州到深圳的这条路过去走了。”

姚科吸了一口烟，感到烟味很好，心里有说不出的舒服。

他吐出一团烟，说：“不要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要是没有路呢？”

“有路。”李志威接过话说，“共产党的政权刚刚建立，边境管理还没有跟上，混过去问题不大。”

“你怎么知道边境的情况呢？”

“在武汉听一个朋友讲的。”

过了一会，赵长禄对李志威和姚科说：“我也到香港去。一个人孤单力薄，想和你们结伴同行，不知二位是否愿意？”

“好哇，”李志威高兴地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以后，我们就在一起搁个伙。”

姚科也极力赞同三人结伴。他对赵长禄说：“三人同行长者大。你比我和李先生大两岁，以后，我们中的事情由你牵个头吧。”

“我举双手赞成！”李志威立即表示了态。

赵长禄不好意思地推道：“那怎么行呢？”

“不用推了。”姚科说，“三人有两人推选了你，这还有什么话说呢？”

赵长禄觉得不好强推，笑着说：“我们萍水相逢，二位这么信任，我只好接受了。今后，我有不到之处，二位要多多包涵。”

李志威和姚科连连点着头。

列车缓缓进入广州站。

车门一开，旅客们一窝蜂地往下涌。然后，又纷纷往停在旁边的一列车上冲去。

“这是怎么回事？”姚科扶着眼镜边跑边问赵长禄。

“快跑上去，我听旁边一个人说，那趟列车是去深圳的。”

三人拼命往前跑。

那时，铁路运输刚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管理工作还没有走上正轨。车站出口处无人查票，到深圳也不需边境通行证。国民党在大陆的许多残余分子利用这个空子，逃到了香港、台湾。

他们在混乱中被人流推到去深圳的列车上。

冲在前面的李志威在七号车厢抢到三个座位后，连忙将赵长禄和姚科喊拢去。

李志威喘了两口气，捋了一下散在脸上的长发，高兴地说：

“我们再不用怕了。”

赵长禄提醒他：“不能想得太简单。”

“为什么呢？”

“深圳虽然离香港很近，它毕竟还是共产党管辖的地区。要在那里碰上公安人员，岂不是麻雀跳到糠缸里，空喜一场？再说，香港是英国人管辖的地方，在那个陌生的世界里能否站住脚，还很难说。”

“对！”姚科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说不定我们到香港后，比在大陆还难些。”

李志威听赵长禄这一说，感到自己高兴太早了。他挠了一下头，不好意思地说：“你们言之有理。在没有踏上香港的土地之前，我们是不能大意。”

.....

四小时后，列车进入深圳站。

车站人声鼎沸。异常热闹。小贩们的叫卖声、喊人的声音，还有小孩子的哭喊声，震耳欲聋。酒店、旅店拉客的“黄

牛”^①在旅客中穿来穿去。站台上用大红布扯起的：“欢迎旅客光临”的大幅标语，被风吹得沙沙的响。

赵长禄他们下车不一会，被长兴酒店的“黄牛”连推带拉地弄到接客的三轮车上。

长兴酒店座落在深圳市中心的十字路口，高两层，有一百多个床位，是城内最高的建筑，也是全城最好的酒店。

当天下午，长兴酒店特地为“光临”的旅客举行了接风“晚宴”。宴毕，店里的“黄牛”倾巢出动，为各房间的旅客端茶送水。矮胖得象个棉花包的黄老板拖着沉重的身子，假情假意地到旅客房里去问寒问暖。旅客们对酒店热情周到的服务，十分满意，暗暗庆幸住上了好酒店。

赵长禄被“黄牛”安排在二楼东头的单人间，李志威和姚科住在赵长禄对门的双人间。

八点。酒店闹哄哄。

赵长禄洗完澡和衣服，感到很疲倦。他准备上床休息时，酒店的黄老板半推开门，手扶门拉手，笑嘻嘻地将他长得很肥的头探进来说：

“先生旅途辛苦了。”

“你好，黄先生。”赵长禄礼貌地回了一句。

“本店服务如有不周，先生可随时提出，我们一定改进。”

“很好。”赵长禄说，“十分感谢店里为我们提供的优良服务。”

“不必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黄老板脸上、脖子上多

^① 深圳、香港称听差、打杂的人为“黄牛”。

余的肉不停地颤动着。

黄老板要走时，赵长禄问：“我们在这住一晚需多少钱？”

“哎呀，”黄老板将门推开，搔头弄姿地说，“刚住进来何必说钱的话呢？本店是旅客之家，服务至上。你钱多，我可多收一个；钱不够，少收一个，没有钱，可以一个不收。”

“哦……你们的生意做得活。”

黄老板将手上的烟递到嘴上吸了一口，又笑咪咪地问：“这样服务，你们满意吗？”

“满意，很满意！”

“哈哈……”黄老板乐滋滋地歪走了。

赵长禄关上门。

逃命人的警觉性往往比正常人要高得多。赵长禄皱着眉头，不安地在室内踱来踱去。“黄牛”的热情，老板的殷勤，使他感到反常。他想：“我到过很多地方，也住过不少旅店，怎么这个酒店的经营方式、服务态度与别的地方不一样呢？老板这样做，是为争生意而让人为他做宣传，还是有其它目的？竞争吧，其它小店根本无法与这座第一流的酒店匹敌；如果不是竞争，他们为何这么热情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

黄昏。天边一抹红霞和灰色云朵逐渐溶成一片，薄雾笼罩着深圳河两岸。远处，不时传来几声“汪汪”的狗叫声。

赵长禄带着李志威和姚科来到深圳河北岸侦察过境路线。为麻痹两岸的警察，他们装着散步，边走边谈话，故意显得若无其事。其实，他们的眼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搜寻河两岸的防卫情况。

他们到了罗湖桥头。

桥的两边都有人站岗。深圳河两岸架了三米多高的铁丝网，还没有流动哨。从侦察到的情况看，他们感到：由罗湖桥进入香港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人灰心丧气地回到长兴酒店。

姚科一进门，懊丧地说：“到这里来过不去，真是糟糕！”

“咳！我太高兴早了。”李志威说。

“我们要赶快想办法走，在这里呆长了不安全。”

“哎，”李志威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得意洋洋地说，“我们不是带着几个现洋吗？乘天黑时，给那些站岗的家伙一人送几块。吃人的口短，得人的手软。他们得了现洋，肯定会放我们过去的。”

“那千万做不得！”姚科摆手说。

“怎么做不得？”

“人家不会要的。”

“俗话说，好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我不信他们不爱财。天黑了，我就去试试。”

“你呀——”赵长禄指着李志威的头说，“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你以为共产党的士兵象国民党的士兵那样见钱眼开，那是大错特错了。听说他们的士兵连拾到一分钱，一个子弹壳也要交公。你送银元去，他马上要把你抓起来。”

“那……”

“那千万做不得！”

“我还有个办法。”李志威显得十分自信。

“什么办法？”

“趁天黑强行冲过去！”

姚科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阻拦说：“那更做不得。人家的子弹比你的脚不知要快多少倍，跑到这里来把命丢了，太划不来呀！”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怎么办？”李志威不满地顶了姚科一句。

“慢慢想办法嘛！”

“情况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赵长禄怕他俩争起来伤了和气，劝李志威：

“你不要急。姚先生的心情同你一样，巴不得早点过去。但现实又不可能。你提的两个办法行不通。我想，昨天来深圳的人中，估计大部分是到香港的。我们可以分头去打听一下，看他们怎么走法。如果有好途径，我们跟着他们一起走。”

“这样也好……”

这时，一个满脸胡子，恶眉细眼的“黄牛”端着一盘又大又红的苹果走进来。他深弯着腰，殷情地说：

“请诸位先生用水果。”

“谢谢。”赵长禄说。

“黄牛”一出去，赵长禄赶紧关上门。然后回过头说：

“我对这家酒店有怀疑！”

“怀疑啥？”李志威不解地问。

“他们对我们这么热情，是一种反常现象。”

“我也这样想。”姚科说，“《晏子春秋》里面讲，‘藏大不诚于中者，心谨小于外，以成其大不成’。自古以来，办店开馆，都是为了赚钱，而这家酒店好象不是为了赚钱。既然不赚钱，店里为什么要置这么好的设备？为何那么起劲地在车

站拉客，每餐办这么多鱼肉，怎么不收伙食费？我看这里面有名堂。”

李志威对赵长禄和姚科的议论很有意见：“我看你们是曹操疑心重。人家热情招待，你们反说人家‘藏大不诚’，‘有名堂’，不应该啦！”

赵长禄见李志威一有气时，露在外面的四颗门牙不住地移动，凸出的眸子几乎快要掉下来，忍不住用手蒙住嘴笑。

姚科怕说多了李志威的脾气大发作，坐在椅子上再不讲话了。

过了一会，一个头戴瓜皮帽、嘴里叼着烟的瘦高个子“黄牛”鬼鬼祟祟地推门进来了。“黄牛”用他那老鼠眼扫视了房屋里的三个人后，故意带着神秘的口气问：

“你们都是到香港去的吧？”

赵长禄不知他问此话的意图，机警地反问道：“你问我们是什么目的？”

“没有什么目的。”“黄牛”轻声细语地说，“到酒店的旅客有很多人要去香港。由于罗湖桥两边看守很严，不易过去。今天下午，共产党又开来一批军队，去香港的旅客害怕抓走，要求酒店帮助过境。我们考虑再三，决定为旅客们做个顺水情，把大家送到香港去。你们如果愿意走，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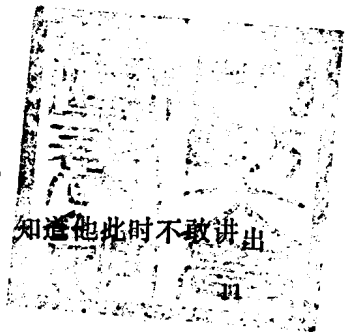
“你们能送旅客过境？”

“能够。”

“怎么送法呢？”

“我们……老板暂……不让……”

赵长禄见“黄牛”说得吞吞吐吐，知道他此时不敢讲出



来。他对“黄牛”说：“不讲也可以，只要把我们送到香港去就行。”

“……保证将你们送……过……”

“那好！”

李志威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笑着对“黄牛”说：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黄老板能把我们送过去，他就是我们一辈子的恩人。日后，我们定报他的大恩大德！”

“不必那么讲”，“黄牛”似笑非笑地说，“急旅客之急，解旅客之难，是我们酒店服务的宗旨嘛！”

尽管“黄牛”说得十分真切，赵长禄对长兴酒店总有怀疑。他向“黄牛”试探道：

“今天晚上能走吗？”

“恐怕不能。”

“什么时候走呢？”

“等……等两天吧。”

“等一天不行吗？”

追问紧了，“黄牛”心里紧张起来：他们莫非是共产党的便衣？我们的秘密要被他们发觉，那就麻烦了。狡黠的“黄牛”也用试探的口气问：“三位是真到香港还是假……”

“真去香港！”

“真的呀？”“黄牛”惊悸地问。

“当然是真的。”

“真的就好！”“黄牛”白得似雪的脸立刻转了色，“我马上去跟黄老板说一声。”

“黄牛”出去后，李志威举着双拳头，跳起来兴奋地对赵长禄说：“我们再真不用担心了，共产党的子弹让那些跑不

了的人去吃吧！”

“还没有过去何必那么高兴呢？”赵长禄给他泼冷水说，“‘黄牛’是跑腿听差的，黄老板安的什么心，他不一定知道。没有过境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我们思想上还要作最坏的准备。”

李志威感到自己又高兴过早。他挠着头后悔地说：“你说的有道理。”

李志威和姚科回房休息去了。

赵长禄轻轻地关上门。他半坐半睡在床上，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又吐出一股浓烟。“黄牛”的话，在他脑海里打上了一连串问号：深圳到香港只有罗湖桥一条路可走，而这条路又走不通，黄老板他们从何处送我们过境呢？黄老板为何不要“黄牛”先告诉我们过境路线和时间呢？还有，“黄牛”把我们车站拉到酒店来，先不收吃住费，又鱼肉相待，是不是设的个圈套呢？说他们是共产党吧，他们的谈吐、行为又有些象。这家酒店是不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地下活动据点呢？

越想，赵长禄越感到这里面有问题。但问题究竟在哪里，现在又看不出来。他暗暗告诫自己：“明天、后天，一定要小心……”

第三天深夜。

赵长禄刚入睡，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惊醒了他。

“开门！”

“谁？”赵长禄问。

“是我们，快点把门打开。”——“黄牛”在外面答。

赵长禄忙翻起来，披着衣服去打开门。黄老板与“黄

牛”迅速闪进房内。

“黄先生这么晚来，有什么急事？”赵长禄疑惑地问。

“是这样——”黄老板双手抱住赵长禄的肩膀，对着他的耳朵神秘地说，“今晚不要睡觉，我们凌晨派人秘密护送你们过境。与你一起的另两位先生请你顺便说一声。我们不再另行通知。这几天的住宿，伙食费，请你们现在到楼下会计室去结一下。”

“什么时候集合？”

“凌晨一点半。”

“从什么地方过境呢？”赵长禄不放心地问。

“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就会知道。”

“你们收过境手续费吗？”

“分文不收，全是为大家帮忙。”

“要是被共产党或香港警方抓住呢？”

“这不用担心，保证你们安全过境。”

“你们是什么人？”赵长禄进一步追问着。

“做生意的呀！”

“生意人为什么能帮我们过境呢？”

“这……”黄老板答不上来。

黄老板走后，赵长禄连忙过去把李志威和姚科喊起来，并把黄老板刚才讲的话原原本本地向他们说了一遍。

姚科揉了揉眼睛，心焦地骂道：

“他妈的，黄老板他们搞的个什么名堂？！”

“我也不知他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赵长禄说。

“跟不跟他们一起走呢？”

“商量一下吧。”